

政治生态学:生态学内容和方法上的考察

——安德烈·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温晓春¹, 韩欲立²

(1.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上海市 200241; 2.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上海市 200433)

摘要: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高兹在实践方面逐渐牢固地建立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学的批判路径。他的生态批判不仅是全面的,而且还有一个尤为显著的特点:他从生态学内部挖掘出人文的、政治的意蕴,即政治的生态学方法,这种方法展现了一种生态和谐的生存方式。正是因为这种从生态学内容和方法上考察的研究范式使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其他生态理论家的思想区别开来。

关键词:安德烈·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专家统治;真正民主;自我管理;社会谋划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6-0099-05

高兹的“生态学”批判,是从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与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比较,从生态学的方法上来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如何影响生态学及现实的生态运动的发展,以致失去了其内在人文、政治因素的。可以说,他的“生态学”批判是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批判的发展,既批判地继承了源于浪漫主义之根基,来源于韦伯对合理性和世界的“去魅”的批判,不仅深受伊凡·伊里奇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生态学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的思想。

一、生态学:研究生态问题的自然科学基础

生态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是研究生态问题的自然科学基础。生态学(ecology)最先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于1866年所创。从词源学上看,前缀“eco-”表示“家园”;后面的“log”除了表示万事万物之间的本质关系之外,还表示如何表达这种本质关系。因而,ecology这个单词的原初意义就是指动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海克尔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有机、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尤其是指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全部关系。高兹指出,与工业系统不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再生和自我重组(self-reorganization)能力,这种能力使它调节其自身系统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生态系统的自我再生和自我重组能力被合理化和统治自然的技术所破坏。

高兹认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在其与地球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涉及的文明。他阐述了生态学和经济学各自的学科领域及清晰地区分了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不同。在他看来,“生态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并不适用于那些生产方式对环境不存在持续的或不可挽回影响的社会或民族——自然资源似乎取之不竭,人类活动的影响可以忽略。在理想状态下,对自然的驾驭是建基于熟知的不成文规则之上,就像健康生活的艺术”^{[1]15}。生态学关注的是经济活动必须遵守的外在限制,以避免经济活动产生与自身目标相悖,阻碍自身发展的后果。但经济学关注的是当个体活动产生了过量的集体成果

* 收稿日期:2011-03-16

作者简介:温晓春(1978-),女,辽宁鞍山人,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研究”(11CKS022),项目负责人:韩欲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历史唯物主义再发现: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10EKS002),项目负责人:韩欲立。

时所造成的外在限制,它是在互惠和自愿合作的领域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受经济理性的潜规则支配,遵循“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越多越好的原则。经济理性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和异化,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态学则属于超出经济活动和计算的领域,并不是一个包含经济合理性的较高合理性,它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意识到经济活动的效用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之外的条件。特别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所造成的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1]16}所有生产都是破坏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逻辑的驱动必然破坏生态环境,任何生产都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联系在一起。

具体而言,经济理性视之为增长的,生态理性认为却是灾祸;在经济理性看来是增值的,生态理性斥之为浪费。因此,生态学就不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学科,生态学应具有单纯把它视为经济学所无法包容的含义,“从经济理性中是无法衍生出伦理原则来的,马克思最早看出了这一点”^{[1]15}。当然,即使把生态学纳入经济学的范畴,也不能从中衍生出伦理原则来。既然如此,生态学就必须突破经济学的界限,探寻一种同经济理性不完全一致的生态理性。“为了理解和克服这些‘反生产性’,人们必须同这种经济理性决裂。生态学应该做的是:向我们揭示如何在物质生产的界限和缩减中而不是在物质生产的增长中,合理地应付稀缺和弊病,合理地应付工业文明的瓶颈和僵局。它应证明,保护自然资源要比开发自然资源、保持自然循环要比打断自然循环更有效和更具‘生产性’。”^{[1]15}但在高兹看来,从生态学中也是不能得出道德规范的,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对独裁主义的抵制和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法,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的抵制不是源于对自然平衡的科学理解,而是产生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生态学是推动对我们的文明和社会展开激烈批判的杠杆,从而促使人类能够对自身行为进行清算,做出人文生态的选择。要使生态学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应重新建立起生态与政治之间的某种联系,揭示生态学和生态问题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一旦使生态学完成了政治生态学的转变之后,其反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功能就将充分呈现。美国社会学家福斯特也认为,当代绿色理论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难以协调一致,正是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导致了生态学,特别是社会生态学的发现。^{[2]19}

高兹认为,生态学包含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基于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从科学上寻求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技术与污染的界限范围。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在不危及生态再生能力的情况下,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条件和界限;另外一种方法是政治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作为“科学分析”的“绝对不可避免”的产物得以表达,以避免产生一种科学的和反政治的教条主义的新观点。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科学的和反政治的教条主义意味着将政治实践和观念在科学上证明为必然的,于是否定它们独有的政治特性^{[3]55}。可见,生态学的科学的和政治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彼此互相排斥。方法不同,它们所规定的生态学的理论基调也不同,确立的对象的存在方式也各异。诚如海德格尔所言:“一种方法概念愈真切地发生作用,愈广泛地规定着一门科学的基调,它也就愈原始地植根于对事情本身的分析之中,愈远离我们称之为技术手法的东西,虽说即使在这些理论学科中,这类技术手法也很不少。”^{[4]32-33}

二、科学生态学:专家统治的社会

科学的生态学方法是与工业主义及其工具理性的霸权紧密相连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方法使自然成为可测量的和可计算的。虽然,它承认应限制盘剥自然资源的需要,也主张替代空气、水、石油和森林等长期合理性管理的需要;它还意味着要为这种限制和替代制定相应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根本无法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获得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原因在于,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生态学的方法也任其选择和由其决定,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形式,已被刻上资本主义的印记。科学的生态学方法的旨趣——在不危及生态再生能力的情况下,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条件和界限——有利于资本追逐利润的目的,必然成为“显学”,而具有人文意义、民主特性的政治生态学方法被遮蔽起来。在科学生态学方法的盛行之下,政府关于生态界限的重视通过禁止、行政管理、税收和罚

款等方式来实现。于是就导致了社会他治的日益增长,即不是靠人的自觉意识行为,而是依赖外在强制执行。行政机构极力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但又与个人的动机和利益无关的结果规范化、职能化。财政金融的他治管理既能够趋向于生态共存性的目标,又不需要改变社会行动者的价值、动机或者经济利益。于是,“在工业主义和市场逻辑中,生态界限的承认导致技术官僚主义力量的扩张。这种方法来自前现代的观点,具有反政治的特点。它通过指派政府及其专家去评估一般利益的内容和设计个人屈从于它的方式,进而消除政治自治以有利于专家统治。一般与特殊被分离开来,人类的较高利益与个人的自由和自主判断能力被割裂开”^{[3]57}。一切知识、技能、技术等都为专家所垄断,即使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也为专家占为己有,作为父母、亲人和朋友所应该履行的事务都为代孕母亲、儿童保育专家、看护老人的保姆等商业化服务所取代,进而迫使人们事事必须求助于专家。专家就意味着真理,代表着权威。专家统治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剥削的、不平等的社会。而所谓的专家,实际上是体系的障眼法,“他们的工作不外乎操弄导引他人,他们向来自诩的责任感和自发性其实是建立在众人的责任感和自发性一直被抹杀的这个基础上。君子不器,因为时时以他人作为器。层级权威森严、整个世界高度理性化而且毫无人味儿……这一切都是生命支离、工作破碎的公民为他们的富裕丰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5]152}。

在这一社会中,生态责任(the ecological imperative)是模糊不清的。一旦权力机构抓住了生态责任的模糊性,那么它就成为增强权力机构控制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借口和手段。这样就使它与自身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运动的生态运动的原初目的和意义相冲突。生态运动最初是出于自发地抵抗因经济和行政权力机构所造成的日常文化的破坏而产生。也就是说,它是在生态问题引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品质恶化之前就产生了。此处所谓的“日常文化”,指“直观知识或地方性的技术诀窍(在此种意义上由伊凡·伊里奇提出的术语)、习惯使个体能解释、理解及他们对居住在围绕他们的世界所承担的责任的行为规范和方式的纯粹不证自明的集合(the whole self-evident collection)”^{[3]57},也就是人们对于其所处的世界的直观、体验和理解形成的总的集合。

人天生就具有领会世界的能力。世界越复杂,那么人对于世界运行的直观领会就越少。专家统治的社会,只有少数专家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大量的科学知识和高超的技能。而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和掌握大量的详细知识,每个人只能掌握被预先设定好的部分的、专门化的知识。一个复杂的社会犹如一个大型的机器装置,它的运作需要个人在功能上被专门化,就像身体的器官或机器的零件一样。这样,“社会不再蕴含足够的文化资源以使个人在世界中寻求方向,给予它们所做的事情以意义,或理解他们付出辛劳从事事业的意义”^{[3]58}。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高兹指出,“保护自然”在根本上应该理解为“捍卫生活世界”。对他而言,“生活世界”既是社会个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又是社会个人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因此,“捍卫生活世界”不是只局限于缺少合法性地区的少数人的愿望,而是与人类的利益和作为整体的生活境况相一致的渴望。

三、政治生态学:真正民主的社会

政治生态学是一种与科学的生态学方法截然不同的方法,是政治的生态学方法。对高兹而言,“政治的”(political)是古希腊意义上雅典人所指的“城邦”(Polis),它立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是作为公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那种政治。它传达了一种积极行使公民权的含义,即积极参与民主化自治过程。而这种公民行使公民权,参与民主自治的意向也蕴含着“家”的意思,这层意思本来就包含在生态学一词的希腊词根“oikos”(家)中。此处的“政治”是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具有规范、生态、创造性的内涵。

因此,政治生态学确立的生态学基调是人文的、民主的、自足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存在方式。它的根本目的是在政治上重建一方面较少地工作和较少地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恢复每个人享有更多的自治和更多的生存安全。因此,不能把政治生态学理解成政治学或生态学的任何一个分支,或理解成政治学与生态学的简单相加。台湾评论家宋国诚就将高兹的政治生态学理解为一种“新经济学”、“激进政治学”,这样必然会消除政治学与生态学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洞悉政治生态学的内涵和存在论上的意义。

政治生态学不是从关注实事的方面来描述生态学的对象是“什么”，而主要描述生态学的“如何”。它不再依据科学逻辑或工具理性，而诉求于伦理与文化。政治生态学赋予生态学以实践性，它“在不断要求促进另一种文明的同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的实践”^{[6]71}。由此，政治生态学不再是一门抽象的纯理论科学，相反，使生态学赋有了人文关怀。它将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变换作为自己的对象领域，换言之，它不仅对人的剥削关系展开强烈的批判，而且也对蚕食自然的暴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指责。此外，它内在地蕴含着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协调发展的存在规范。政治生态学的问题是“必然性与标准化的追溯性联结的问题”，“标准行为是与被经验的和影响在客观必然性中被认识到的形式的需要相对应的”，而这种对应“不是别的，正是民主政治问题”^{[3]60}。

（一）自我管理：自治权的核心理论

1968年法国五月运动的失败使高兹看到，需要一个由群众组成的革命政党来组织和领导成功的革命运动。为确保它是真正的群众政党，高兹主张将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作为政党的基础。在工厂委员会中，工人的自我管理是工人阶级保持其对工厂、政党和社会普遍控制的唯一方式^{[7]223}。

高兹与卡斯托利亚蒂斯一样，把自我管理看做解决由苏联经验建立的二元社会的手段。但与其不同，高兹还采纳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多里奥·佛阿和布鲁诺·特伦廷关于自我管理的看法，即有计划的改革和复兴现存的工会运动，并把这一思想与萨特的批判异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结合。同时，高兹根据现代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极力提倡以自我管理克服在工厂中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异化问题，而自我管理的实现需要去除中心化和工人的自治。

自治能力是实现自我管理的先决条件。在前国家的社会状态，人是自治的。在高兹看来，自治能力的破坏和由它所引起的文化同一是与因国家导致的市民社会的摧毁有着必然联系的。随着国家公共机构活动的加强和扩张，公共机构职责的扩大促进了深一层的职业化、专门化和所有活动的颠覆，由此加速了市民社会的衰落。国家取代了市民社会，在政治层面上，他治管理取替了自我管理。“在国家的遮蔽下，市民社会的消失引起（initiates）基本自由的幻灭和或多或少地军事化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制度内，国家操纵着一切。”^{[1]38}

此处的“市民社会”，不同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将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的“市民社会”。黑格尔虽然揭示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但他却试图不触及市民社会的基础去克服市民社会的困境实现同一。而且高兹所指称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两种市民社会的含义。高兹所说的“‘市民社会’指在团体或不依赖于政府调节或权威机构而存在的共同体的结构内，个体在他们自身中建立的社会关系网。它包括建立在互惠和自愿基础上的一切关系，而非基于法律或私法规范之上的关系”^{[1]35}。“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体，是建立于互惠和自愿基础上，没有外在的政府机构干涉的个人自治关系的联合体，它是一种前国家的社会状态。

国际分工所具有的极高程度的专业化特征造成了必须具有一个高于工厂层面或者至少在工厂层面的决策权力存在，这种决策权力的集中化与非中心化和自治的策略在根本上是相抵触的。在权力集中和专业化的经济中，自我管理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授予工人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的权利也无法实现生态和谐的生产和消费重构，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管理。在生产的技术分工和工人的自治之间的矛盾方面，无限制发展的资本主义技术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的实现产生了本质的和具有必然性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不仅支配着自然，而且支配着工人自身。在高兹思想的这个逻辑节点上，资本和自由之间的死结，应当而且必须由政治生态学的方法来打开。具体而言，彻底地变革生产目的和技术，改变生活方式就成为必要的。“自我管理必然需要足够小和足够多样的社会和经济单位才能提供给共同体以广泛多样性的人类才干和能力，以丰富多样的人类交换和相互作用及起码部分地调节地方需要和偏爱的生产的可能性以确保最基本的自立。”^{[1]39}

自我管理意味着工具能依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和目的来管理。在技术上，这些工具的创造、生产是现实可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要退回到家庭手工业或中世纪，而是使工业技术从属于个体的持续发展和集

体自治,而不是使自治服从于工业技术的持续扩张。自我管理必须建立在联合的生产者的仲裁能力的基础之上。“这种能力不仅能够仲裁生产单位产品时劳动所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量与质,而且能够仲裁他们期许的得以满足的需要和渴望的程度与他们予以付出的努力的量。这种仲裁能力是基于大家熟知的、共同规范之上。”^{[3]61} 仲裁有利于以较低的生产成本通过更为轻松和满意的工作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因此,它不仅可以将生产成本,降低付出的辛劳程度,而且能对人的需要和渴望加以控制与限制。

自我管理意味着必须拒绝建立在对个体和自然的支配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一种建立在“个体之间的合作以及与自然的合作”基础之上的“后工业”技术。而这样的技术替代方式在根本上是“生态”的。这也是政治生态学所蕴含的民主社会的应有之意。

(二) 社会谋划:自我设限

实际上,大家所熟知的、共同的规范就是自足的规范。自足的规范包含着需要和付出辛劳的自我界限,它是和经济合理性与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率不相容的。

自足的规范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中。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合理性并没有充分展现出自身的本质。生产者之间与商人之间形成默契,都不希望在自由市场上自由竞争。工匠满足于自己的辛劳所得,商人也满足于自己的所得利润。在那样的生产条件中,他们都能自给自足。对于工人来说,“多挣钱的机会不如少劳动的机会更有吸引力”^{[8]32-33}。随着经济合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充分展开,谋求最大利润率的目的逐渐地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常文化等,而这些恰恰是孕育自足规范的沃土。于是,自足规范已失去了作为自我设限的引导作用。然而,自我设限仍保持着趋于生态和谐的工业文明的唯一的非独裁主义的、民主的方式。因此,要恢复自足规范,实施自我设限,不能建立在现存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它是一个政治任务,更为准确地说是生态政治学和生态社会学的谋划。

生态—社会政治学为自我设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它通过实现真正的民主,人人能够参与政治,让政治权力的规范运行确保和强化政治功能,将政治的意义转化成一种强劲的动力,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促进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具体而言,在保障基本收入,即不减少收入额度的情况下,缩短劳动时间,保障每个人成为自由的人,更放松地工作和过更丰富多彩的生活。于是,自我设限由个人选择的层面就上升到了社会谋划的层面。政治参与可以说是高兹道德真实性问题的个人解决方式。“政治生态学将生态上必然的改变应用于生产和消费方式上,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中,将它作为标准化理想的转变杠杆。在生态的意义上保护生活环境和重建生活世界,彼此互为条件和互相支撑。二者都要求生活和现实环境从经济学的支配下脱离出来,二者都要求各个活动领域的增长,而经济理性不在其中起作用。”^{[3]65-66} 政治生态学的理念打破了经济理性所遵循的“更多”和“更好”原则的联系,凸显出“较少”与“更好”的范畴。当然,“较少”与“更好”这些范畴本身还需人类共同体在社会斗争的语境中赋予具体的意义。

综上所述,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特征”^{[9]576},它的基础不是纯粹哲学的,就其根本特征而言是“唯物主义的”,这一点与福斯特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时它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只有将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高兹,理解高兹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 [2]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3] André Gorz. Political Ecology: Expertocracy Versus Self-Limitation[M]. New Left Review I/202, November-December 1993.
- [4]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5] 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 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M]. 赵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6] (法)安德烈·高兹. 致 D 情史[M]. 袁筱一,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7] Artbur Hirsb. The French new lef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Sartre to Gorz[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 [8]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彭强,黄晓京,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9] 俞吾金,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